



杜任之同志建国初期小照

山西文史资料 6/98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文史资料

1998年第6期
(总第120辑)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丁天顺

责任编辑:张云

山西文史资料

第120辑

1998年11月15日出版

主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850×1168毫米1/32

编辑: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山西省应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

国内外
发行:《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35号

电话:3045471-3115、3118

ISSN1004-5910
刊号:CN14-1023/K

邮编:030074

定价:6.00元

305/12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 姚真中 李蓼源

主任 赵政民

专职副主任 解宪卿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丹保安 任国维 乔志强 赵望进

贾鸿鸣 聂嘉恩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马山明	尹世明	王艾权	王书福
田树荃	田斌文	卢润生	兰安乐	孙丽萍
戎晓峰	刘存善	刘胜章	刘大寿	刘忠伟
任铎夫	朱 殊	杨小池	杨玉印	谷淑梅
沙万里	李 泰	李小强	李可凤	李茂盛
李桂琴	李夏林	宋富盛	宋发科	吴体刚
张 平	张安塞	张志安	张爱国	张凤山
张金盛	张国荣	张 苏	陈正全	孟昭民
武胜利	周 典	周志清	贺德宏	祝大同
郝 智	郭行杰	高 可	高春平	高凤鸣
耿析镛	徐亚东	陶正刚	贾 真	阎全鲁
崔俊恒	谢 泳	谢克昌	董耀章	董维民

主 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王书福

编 委 周志清

本辑责任编辑 张 云

目 录

往 事 追 述

- 缅怀杜任之先生·····余 振(1)
忆杜老·····贾献琰(8)
-

回 忆 录

- 九十自述·····徐士瑚(14)
耄龄忆旧·····郭思俊(65)
-

国 际 友 谊

- 八路军营救美国飞行员始末·····王士廉(75)
中国是他最留恋的第二故乡
——缅怀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李东光(80)
-

军 事 笔 记

- 打开太原门户
——激战小窑头·····邓仕俊(88)
-

峥 嵘 岁 月

在 407 部队的工作回忆

——把阎敌“百里圈”碉堡工程搬到十八兵团

..... 刘 展(101)

回忆山西吕梁十分区工作开辟情况..... 杨 琦(107)

阎 锡 山 研 究

《阎锡山日记》述略..... 李蓼源(114)

一 代 风 流

我在解放前后的一些经历..... 张 咏(144)

焦卓然先生和他编纂的《中华国难教育读本》..... 孙觉民(155)

张瑞玘其人..... 卫洪平(162)

乡 风 民 俗

民间艺术瑰宝

——中阳民俗剪纸与“剪纸状元”李爱萍..... 施国祥等(174)

晋 商 觅 踪

清代山西票号分布图..... 田树茂(178)

史 实 考 辨

忻口战役日军究竟有多少..... 刘存善 刘大明(183)

纪念杜任之先生逝世十周年专栏 缅怀杜任之先生

余 振

杜任之先生是我一生中永远不敢忘记的师友之一。

193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太原，在海子边中外语文学学会偶遇翟新亚同志，经他介绍，认识了杜先生。他简单地介绍说：“这是李毓珍，崞县人，是在监狱里同时被关押的朋友。”杜先生很亲切地跟我交谈起来。知道我是学俄文的，还未找到工作，他就说：“那很好，懂俄文的人很少，给我们的刊物翻译点东西，多少还有点稿费。”随后，我就给学会的刊物《中外论坛》翻译了一篇《苏联货币》（以后每期有我译的一篇）。

《中外论坛》编委侯外庐、张友渔都是我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时的老师。这篇译文由张友渔先生审阅，张先生看过文章后说：“译得还不错。以后请这位译者多译点东西。再译出来也不必送来了，可以直接送印刷厂。”后来，杜先生提名让我参加编委会。编委会的编委都是一些有名的学者，如侯外庐、张友渔、邢西屏（徐冰）、温健公、周北峰等，都是北平、太原各大学的教授。

后来，我参加过一次编委会，会议决定大家分头翻译《列宁全集》。记得学会里的全集是俄文第二版，全部30多卷。俄文版以

外,还有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版,但好象都没有译完。给我分了一卷俄文本,另一卷分给了我的同学张灵轩。其他每人一卷英文本或日文本。后来,学会被迫解散,《列宁全集》的翻译工作只好作罢。

中外语文学会还设有中外语文补习班,设在三圣庵晋阳饭店内,已开办的有英文、德文、日文三科。当时还拟议开设俄文班,让我担任教学,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又准备开设拉丁化新文字学习班,由外地来的一位同志担任文字课,由我担任理论课。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突然发生了变故——教育厅负责编《小学教师》的冀云程同志因在该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而被捕牺牲(冀云程是1935年平民大学毕业的,平民大学跟北平大学法学院离得很近,我在北平读书时也曾与他有过一定交往)。于是拉丁化新文字班只好不了了之。

193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命令阎锡山“查《中外论坛》专门翻译外国共产党的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混淆视听,应予查办。”阎在来文上批示“照办!”《中外论坛》随即停刊,中外语文学会也被迫解散。这时,红军由陕北过河,要经此路开往前线抗战。阎锡山出兵迎头痛击,并在山西全省加强了反共的布置,一片白色恐怖。杜先生另外领导的“西北剧社”、“艺术通讯社”也都被解散,剧社的刊物《文艺舞台》也被停刊。

不久,阎锡山把他手下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原有人员合组成一个大杂烩“自强救国同志会”。杜先生既是归国在山西宣传策动抗日,自然不能脱离阎锡山的组织,他也是这个“团”的领导之一。他把原来中外语文学会、西北剧社、艺术通讯社的同志们合组在他所领导的那一部分里(当时我因妻子病逝送她的灵柩回老家崞县去了)。我与西北剧社张季纯编在一起。张季纯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国后历任北京文化局局长、市文联副主席。

1936年夏,山西组织了“暑期健身团”,原命名为“暑期抗日团

练团”，为避免刺激日本人而更换名字。该团位于小北门国民师范学校内。我从老家返回太原后，参加了健身团，编在杜先生担任指导员的那一队。在健身团的活动中，由于得了痢疾，身体垮了下来，我没有参加到结业。

健身团临结业前，杜先生贴出一张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壁报，得到全体人员的赞同，后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随后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都是当然盟员，杜任之、宋劭文、牛佩琮、戎子和、张隽轩等九人任临时执委。10月间薄一波同志担任常务秘书后，山西抗日救亡运动便进一步开展起来。

牺盟会成立时，杜先生仍把我编在他所领导的那一部分里，健身团结业后，我也曾去杜先生家参加过多次牺盟会的活动。这时期，杜先生领导的中外语文学会、西北剧社的同志都加入了牺盟会，并创办了刊物《突击》，用木刻家李桦的一幅木刻《一个挣脱锁链的囚徒》做封面。

1937年初，为了生计，我到兵工厂总务处文书系当了个专搞“等因奉此”的“秘书”。该厂是军事性质的工厂，管理极严；不能请假外出，牺盟会的活动就无法参加了。直到1937年10月初，随厂逃难到陕西。1938年，我离开兵工厂，到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组成）任助教，从此与杜先生天各一方，隔绝了九年。

1946年春，蒋介石国民党掀起一股全国性的反苏运动。西北大学学校领导，要求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学生们反过来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提出游行由该会领导，反动学校当局不予批准，于是爆发学生罢课运动。学校当局及汉中警备司令部采取逮捕、开除、记过等高压手段，把运动压了下去。十几位被指为学生运动幕后指使者的教授被解聘。我亦在其中。恰逢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先生来信，邀请我回山西大学。于是1946年5月，我应邀前往，并向徐校长推荐了解聘的徐褐夫、李陶达、王文光三教授。

一到山西大学，得知杜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我便立即前去拜访。九年不见，一旦重逢，当然都十分高兴。杜先生对我详细介绍了太原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告诉我，当年的朋友哪些一直很好，可以交往，哪些已经变坏，不可再同他们交往。同九年前一样。杜先生还在这些重要细节问题上热情地关心我。

回到山大大后，我住在教职员宿舍第三排，杜先生住在后边不远的“响杨树院”。因为离得很近，我一有空就找杜先生闲聊。虽说是“闲聊”，从中获益不少。季陶达先生到校后，担任了经济系主任，经济系属于法学院，他同杜先生也合作得很好。

1947年暑假，杜先生邀请经济系主任季陶达、法律系主任徐光达、外文系主任李贯英及其夫人刘毓秀，还有我，连杜先生自己共六人，去晋祠休养一个暑假。晋祠属于晋源县，县长是杜先生的学生，为我们在晋祠租了一个小四合院，派了一名厨师给我们做饭。我们的生活很规律，既轻松又愉快。每天上午读书，午睡后到河里洗澡，晚上大家一起闲聊，也可以说是“神聊”。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学校的情况，无所不谈。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哈哈大笑，谈得最多的是杜先生。

暑假将尽，我们才返回学校。不久，王文光也由南方返回来。他趁暑假去南京探亲。他的夫人在南京中央大学工作，跟刘王立明是好朋友（民盟中委之一）。王文光先生说想参加民盟，就通过刘王立明和上海另一位中委周新民介绍加入了民盟。当即给他一个任务——回太原在山西开展民盟的工作。

王文光回太原后来找我，要我同他一起工作。我们在西北大学时交往很深，彼此深知。我同意之后，当即向他建议：首先应当把杜先生介绍进来。因为杜先生在太原多年，认识的人多，各方面情况熟悉；他参加进来，工作要顺利得多。我把我1935年——1937年间同杜先生的关系告诉了他，他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们三人就建立起山西最早的民盟组织。由王文光任秘书，杜先

生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

我同山大教育系学生马作揖曾创办小型诗刊《北风》。刊物方向很明确：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王文光、李贯英、郝树侯诸先生都给写过文章。杜先生写过《论新诗的形式问题》、《写我们的时代》、《由屈原之死想到诗的道路》等几篇文章。《北风》于1948年1月15日创刊。杜先生、王文光同我联系，希望我们有意识地把这个小刊物作为山西民盟的宣传刊物办下去。办了七期，因受到阎记特务头子梁化之的警告，同年6月11日被迫停刊。

1948年春夏之交，我在《复兴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译文《美国的独占资本》。阎锡山看到后大为恼火。但我是山大教授，不是他的部下，无法直接处分我，这才找机会对我下毒手。有一天，在首义门城门口，他的打手借口说我走错了路，将我痛打一顿。杜先生和王文光知道后，先后跑到我家来看我。看见我被打成那样，都放声大哭，说：“这，我们还能活吗？”杜先生说：“打的不是你个人，打的是山西大学的教授。我们要为争民主、争人权的平等而斗争。”他们回去就召集教授会，宣布罢教，学生们闻讯，也宣布罢课。

因为一篇文章被特务殴打，《北风》诗刊又被迫停刊。我向杜先生和王文光先生提出离开太原的意思，等他们二位征得山大徐校长同意后，我于6月份中下旬离开山大，到了兰州大学。王文光受到阎锡山特务的跟踪，去了南方。杜先生被叛徒出卖，行将被捕，也借机到北平招生，于7月1日离开了山大。一到北平就寻求政治庇护，接着找见地下民盟，从而通过民盟找见地下党组织，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与其他同志联名发表了斥责阎锡山的宣言。

兰州解放后，我于1950年3月奉调到了北京。先在交通大学任教三个月。在交大任教时，一天在北海公园门口，与杜先生不期而遇。我们进了北海，找了个茶座。我先把离开山大到兰大的情况简单谈了谈，又把奉调到京后与领导同志谈工作时发生的误会

告诉了杜先生。杜先生认为，不该计较领导同志谈话的态度，这样一来，恐怕要影响组织问题的解决，今后应当争取早日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杜先生这一席谈，使我端正了对待组织问题的态度。

大概是1953年以后了，经过院系调整，我已由清华大学调整到北京大学，杜先生每次到北大来看望他的老友江隆基副校长时，一定到燕南园我的寓所坐一会儿。以后杜先生在太原工作很忙，我就没有机会再亲聆教诲了。1957年我被错划右派，调到上海辞海编辑所，更无见面机会了，但也偶尔从同乡们口中得知一些有关杜先生的情况，特别是文革中，他受到了“四人帮”很大的迫害。我了解杜先生的性格，他是决不会向“四人帮”低头的。

1985年，我到北京参加苏联诗人叶赛宁讨论会，会后曾专程拜会过杜先生。那年正是杜先生80大庆，室内墙上还挂着同仁们、学生们送他的祝寿辞。杜先生虽然瘫痪了，但看上去体质似乎还好。近来我才知道，杜先生为抓紧时间多做贡献，在那前后长达一年是靠了带毒性的中草药水周身冲洗来活血，以至于慢性中毒反而加重了内脏器官的损伤。那次，我们还一块照了个相。我送了他一本《普希金长诗选》。杜先生说，他的有关孔子的新著出版后，也要送我一本。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晤面。

1988年，山西民盟转来了杜先生的讣告，并且说近期《盟讯》要登载几篇悼念杜先生的文章，要我也写一点。然而，消息太突然了，也太沉痛了！我竟一时写不出什么来，只给山西民盟回了封信，略表自己对杜先生的哀悼之情。民盟从我信中摘录了一段，发表在盟讯上。

现在，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也正想写一点追念杜先生的文字。我只把自己从1935年起跟杜先生的交往，叙述了个大概，以表对杜先生的怀念。

杜先生虽只长我四岁，但从1935年与杜先生交往以来，我一直把杜先生当作前辈先生来景仰。那时，杜先生是德国留学生，又

是绥署参事，而我只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我同杜先生素不识面，又无一点瓜葛，只是凭着翟新亚的一句话：“是监狱中同时被关押的朋友”，杜先生就完全信任我：不但要我为《中外论坛》翻译东西，而且把我跟张友渔、侯外庐、邢西屏（徐冰）等排在一起，作为编委会编委；以后又一直让我参加“健身团”盟会。对我的提携，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等到1946年——1948年我在山大任教时，杜先生给我介绍山西的情况，使我有个正确的方向可循。在民盟的工作中，在《北风》诗刊的编辑工作中，处处都得到杜先生宝贵的指教。建国以来，虽然见面不多，但1950年北海的一席谈，对我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我就是遵循杜先生的指示，于“三反”运动后提出重新入党申请的。只是因为1957年的错划右派问题搁浅了多年，198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可惜当时我因为工作繁忙，也没有顾上写信给杜先生，杜先生如果知道了，是一定会为我高兴的。我们前后两次相处，杜先生深知我的性格——内向，不善交往，因而也不善于做行政工作和组织工作。杜先生曾劝过我，要想法克服缺点；另一方面也给我指出，做好教学工作和翻译工作，也一样是对党对国家的贡献。我在克服缺点之方面做得很不够，但在教学和翻译工作中，我一直遵循着杜先生的指示，尽可能做得比较差强人意一点。

杜先生，我虽然已经离休几年了，只要一息尚存，还要继续作下去，决不辜负杜先生对我的期望！

忆 杜 老

贾献琰

我与杜任之同志是1939年夏相识的。岁月悠悠，一晃55年过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高尚品德和对同志的深情厚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

一、难忘的首次见面

我是1936年10月间，在运中参加民先和牺盟会，1938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负责恢复安置牺公会、四教会（农教会、工教会、妇教会、青教会），并担任中共安邑地下党县委书记。1939年6月中共汾南工委通知让我潜入同志会干训所受训。因我是牺盟干部，去时持乡宁牺公中心区介绍信到秋林上葫芦牺公总部会报到，学习了几天，由总部会把各区潜入同志会受训的牺盟干部，集体送入同志会二期干训所。

到秋林与杜老相识，以前对他即有所了解。他是万荣县七庄村人，早年留学德国，研究哲学和马克思及其唯物辩证法，是一位博学广闻、经验丰富、豁达好客、平易近人的学者。抗战开始，任民族革命大学教务主任，同他工作的有运中王毅然老师及姜耕农等同学，其他随从者也都是进步青年。他每在公众场合谈论、演讲，倡导民主，鼓动抗日，评击时政，言词生动，慷慨激昂，在二战区干

部中很有威望,有人亲切地呼之为“杜克思”。他当时系中共二战区特别小组组长。初次相逢如见故人,畅所欲言。遂将自己曲折经历如实告给,他也亲切地给予指导,讲解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和阎集团中各派系的矛盾;告诫在复杂环境中如何掩护自己,作好地下工作;潜在敌营,牢记毛主席语录:“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病和暴露”。我虽然没有带上党的组织关系,可是相互间心心相印,他把我当作自己同志。杜老是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启蒙老师、指路人、见证人。在每一个斗争的关键时刻,都得到他及时的教诲;每一个胜利,都凝聚着杜老的一份血汗。我尊敬他,接近他,在他的领导教育下进行活动,有所建树。

二、驱逐反共摩擦专家李犹龙

1939年6月底,我从同志会干训所毕训后,被潜到中条山阎七行政区同志会(即精建会)夏县分会任主任。当时,潜在该分会的地下党员还有刘伦涛、邢寿卿、丁建邦、王行甫、王永丰等同志,以后还发展了十多名党员,使这个反动机构及其所领导的县区六会组织,牢牢掌握在我地下党手中。我们经常向杜老汇报工作,他也不断布置任务。同志会未经蒋中央备案,在中条山以“精建会”名义对外,以发展同志会员为主,并建立农、工、妇、商、教育学生六会。那时,阎锡山管辖区没有国民党机构,可是在中条山为蒋军占领区,国民党在各县均设有县党部,七区派有专员叫李犹龙,是个中统特务,十分反动,制造摩擦,积极动员各县县党部建立由他们领导的六会。根据杜老的指示:“要团结进步青年,争取中间派,利用蒋阎矛盾,打击反动势力。”我们同李犹龙的忠实于蒋——夏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裴寿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集会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裴的挑拨离间、企图夺取六会领导权的阴谋,遂激起裴对我的仇恨。

1941年2月，裴勾结蒋军第五集团军一个连，包抄夏县精建会，指名道姓抓捕我，说我是共产党。适我下山开展道北工作，幸免于难，副主任刘伦涛却被抓走。得到恶讯后，化装上山到平陆涧阳镇精建会七区分会，把刘伦涛营救出来。3月下旬，在涧阳镇乘区分会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机会，我和刘伦涛、刘西舟（芮城精建会主任，地下党员）、王绶芳（永济精建会主任，地下党员）共同起草，以中条山民众自卫队名义，印刷传单、标语，揭露李犹龙制造摩擦、破坏群众组织、迫害地方干部种种罪行，到处散发、张贴，并从渑池、陕州、灵宝邮寄各地党、政民运单位予以宣扬，影响波及省内外，造成一定声势。阎锡山为了缓和矛盾，派其高干、曾担任过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李冠洋，到洛阳同国民党会议，终于把李犹龙赶出山西。“晋西事变”后，在中条山精建会与国民党为夺取六会领导权，斗争十分激烈！芮城县党部挂出六会牌子，芮城精建会把它砸了；夏县精建会及时建立起六会，理事多是地下党员，人员健全又坚强，夏县县党部无由插手，遂勾结蒋军围抄精建会，抓我未得逞，乃将副主任刘伦涛抓去，以便夺取六会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下定决心，驱逐李犹龙这个祸首，并且获得胜利。这段历史，称做“中条事件”。杜老撰写的《我的回顾》一文，连续刊载于《山西文史资料》。这篇文章，对“中条事件”这段历史作了详细介绍。

三、打入敌人心脏，夺取其领导权， 有利于地下活动

1941年5月8日，日寇大扫荡中条山，阎之七区军、政、民运机关，均迁驻河南渑池，我代理精建会七区分会主任。为了掩护自己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1942年8月和1943年2月，从渑池去克难坡时，由杜老介绍参加阎锡山的“文人组织”（即进步组织）和同志会“基于”；并多方周旋帮我夺得了精建会七区督导主任职务，兼任平陆县县长，还是七区领导组成员之一。随着合法地位的揭高，

身份的增强,权力的扩大,掩护同志,展开地下工作更加方便了,借此职权,掩护了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举荐邢寿卿为夏县县长,尚勉斋(烈士)为平陆县县长,嘉全义(进步青年)为虞乡县县长,刘学周(地下党员)为垣曲警察局局长。

1944年6月,阎锡山的忠实干将、七区专员朱一民,让他的秘书主任接替了我的区督导主任职务,10月间下令促我回汾南为其开展平陆政权工作。为此我便回到安北,重新建立平陆游击大队和县政府。1945年4月,朱调我任闻喜县县长,曾找党小组长刘伦涛商谈而未见到他。因没有接通党的关系,我断然拒绝了。恰在此时,太岳三分区北沙、邵康同志到我家找我联系,让我接任闻喜县长,与他们配合开展汾南工作。可惜,因已同朱反目,无法开口,答应到吉县要求把工作调回汾南。5月底到吉县,求同志会执行部干管组,调到汾南工作,派我任精建会十五区督导主任,指派书也给了我。岂料,梁化之在隰县来电报云:已派李某去了。干管组收回那张指派书,让我到隰县解救团干部训练班受训。8月,日寇投降,随干管组回到太原。因我的党组织关系在运城,在那里有群众基础,人地熟悉,便多次要求调回运城,不许曾与干管组组长争吵,基干会提意见,关系僵化,成了闲员,只好自谋工作。就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杜老介绍我与同志会宣委会主任周新民相识,举荐我到该会担任三级委员,后改为宣传组任三级秘书。从此我可以在阎首脑部自由往来,在他的领导下,更加有利地从事地下活动。

1946年1月,随平遥解救团到平遥,周新民为团长,我任组长,一度周赴并我代行团长职务。有一天在城北新南堡家访问,一个叫贾永山的把十来个村干部和村民扣捕起来,说他们是“叛人”,要送县府关押审讯。我得悉,赶赴现场将他们立即释放了;华灵中学几个学生因散布“兵农合一好,遍地都是草”的言论而被抓捕,送交解救团,我也将他们释放了。

7月中返并,仍在宣委会工作,求杜老与干管组、组织组说情,